

好乡党，一生情

1997年2月，我被调到陕西澄合矿务局小学，居住在一墙之隔的局中学的院子里。初来乍到，我没有朋友，常感几分落寞。一天，我在厨房门口洗菜，一位衣着朴素的女老师微笑着向我问好。我受宠若惊，急忙应和。闲聊了几句，我们都听出了对方的口音——原来是同一个人！真是“乡党见乡党，两眼泪汪汪”，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。

她就是丽，是高中政治老师，大我几岁，住在我家对面楼上。此后，我得空便去丽家中，与她天南海北闲谈。我们谈话的主题越来越深入，心也贴得越来越近。几乎每天晚饭后，我们

都要碰面，如果我不去她家，她必定会来寻我。就这样，我们慢慢地如同亲人一般，彼此关照。

丽身上最令我感佩的，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。她常对我说：“做事只在乎心，其他不必多问。”有一次，她生病住院，付完住院费后，口袋里只剩下20元钱。邻床有一对农村来的夫妇，出院时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。丽竟毫不犹豫地就把仅有的20元钱全塞给了他们。那对夫妇千恩万谢，坚持要留下丽的地址，说回家后给她寄来自家山里的核桃。几个月过去了，连核桃的影子也没见着。每每说起这事，我总忍不住埋怨她：“你也太实在

了！好歹给自己留一半啊。”她听了，只是平和地笑笑：“他们不容易，回去还有地里的活等着。兴许是事情多，忘了。帮人的时候，本就不图回报的。”

我和丽都是书虫，每读到好文章或一本好书，总会迫不及待地想和对方分享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常常相约去学校附近散步，讲着彼此读过的文章，谈着各自的感想。丽对许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，几乎每期的《中学生时事政治报》上都能见到她的文章。在她的带动下，我也重新拿起了笔，写些教育札记和随感。我们分享各自的习作，直言不讳地给出建议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俩的散文常常轮番出



李彩平(右)母子与丽合影

现在局机关报上，偶尔还能同时刊登。每逢这时，我们都会为对方高兴，彼此鼓励。

后来，我去了省城，丽也被调到市重点中学。我们在各自新的道路上努力奔走，但联系始终不断。如今，我们都已退休，虽然不能像往昔那样终日长谈，但每天清晨，我的手机总会准时响起，传来丽简单的问候。只言片语，便如同拂面的春风，刹那间唤醒心底那份沉淀的暖意。(陕西西安 李彩平 56岁)

第一次领工资

领工资“数落”父亲

1972年初，我们高中毕业。临毕业时，我和另外3位同学幸运地得到工作机会，填写了担任教师的表格。腊月二十六，公社干部骑车到我家传达县里的电话通知，要我正月初四去县城参加教师分配会议。

正月初四，我揣上母亲借来的15元钱，第一次坐火车到了县城。会上宣布了分配方案，我被分到家乡公社担任中学教师。主持人还宣布，发给我们第一个月的工资。虽然只有27元，但这可是我第一次领工资啊！太激动了，我给父亲买了一顶帽子，给母亲买了一双鞋，给自己买了一块布料。回到家，我把剩下的钱给了母亲，她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剩这么多？”我说：“我领工资了！”当时，我还不忘“数落”父亲一句：“幸亏当初没把我留家里挣工分吧？”父亲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时候不是穷吗！”(河北承德 刘朴 71岁)

穿父亲的中山装

上世纪70年代，布票限量发放。每个家庭都是三五个孩子，为了节省，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，老二穿了老三穿。衣服穿得褪色了也舍不得扔，买一包染料染了，继续往下穿。我的少年时代，是穿着父亲的中山装长大的，显得少年老成。1978年，父亲的一件蓝色中山装褪色了，母亲给5角钱让我去买包染料。染色后，旧衣成了“新衣”。这件中山装伴我度过了中学时光。(山西大同 孟晓军 61岁)

征稿

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上无媒不成亲。不少人曾当过媒人，并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如果您有这样的经历，请来稿讲述。欢迎扫描小程序码投稿。



给女儿拍照变合影



1980年1月，女儿出生。她满十个月那天，我们带她到沈阳生生照相馆拍照。这是沈阳最有名的照相馆，但任凭摄影师怎么逗女儿，她就是不笑，就是不高兴，说什么也不照相。可是，我们票开了，钱也交了，怎么办呢？摄影师说：“干脆你们三口来张合影吧。”尽管我们没什么准备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

于是，我们夫妻抱着女儿坐在那里拍照。奇怪得很，这时候摄影师一逗，女儿就笑了，全家福成功了。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在照相馆正式拍的全家福。照片取回来后，我们带回家给爷爷奶奶看。奶奶说：“孩子不会说话，就是想照全家福，你们俩不明白孩子的意思。”后来一想，可能真是这么回事吧。(辽宁沈阳 刘利华 73岁)

穿连衣裙回村，婆婆不让出门

1978年夏天，爱人求同事从北京给我买一件衣服。我知道后，心里直埋怨：一个年轻男同志能买好女装吗？

出乎意料，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件连衣裙，无论款式、颜色和尺寸，都让我很是赞叹。我不是太会打扮的人，平时都不大照镜子，从没刻意追求过穿戴。已经十几年没穿过裙装了，对这件连衣裙，我是打心底里喜欢。星期天回农村婆家，我就穿上了。婆家院子很深，我听到有叫卖声就往外走。我在快出院门那一刻，听到婆婆小跑着出来了。我好奇，她平时走路都比常人慢，今天怎么了？



张琪(左)和工友

我边想边往外走。突然间，婆婆双手拉住我的裙子往后拖：“别出去，让村里人笑话。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：“敢情在村里不能穿裙子呀。”这一天，我都没出院子。咱不能让婆婆生气啊！

没过几天，单位组织去北戴河海边旅游，大家都热衷于照相留念。这

时，我这件裙子就成了稀罕物，一会儿这个穿一会儿那个穿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有三十来个人。其中有很多我不太熟悉的车间女工，都排队等着穿裙子拍照。当裙子再回到我手上时，领口和袖口还有腰部都开线了。我有90多斤，很多比我胖的人都穿着这条全厂唯一的连衣裙照相。我挺开心的，回家后上缝纫机几分钟就搞定了，没一点心疼的感觉。

回想起来，这件连衣裙在当时可算得上时髦货了。不知别人还记得这件事没有，反正我一想起来心里都美滋滋的。(河北唐山 张琪 72岁)

双喜临门戴“双喜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高考前，为了让我在考场上掌握好时间，母亲把她的“上海”表给了我。我考上了军校，全家人欣喜不已，父母商量着给我买一块新表。那时，手表价格高不说，还需凭票购买。父母经过一番托人周折，花50元买到了一块“双喜”牌手表。说起来，我既是上大学，又是参军入伍，也算双喜临门，戴这块表正合适。

父亲把手表戴在了我的手腕上，提醒我到了军

校要遵守时间。这块表是全不锈钢盘面，再加上不锈钢表链，戴在手腕上银光灿灿。去军校报到前，我戴着它走亲访友，一派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状元范。进入军校，我发现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同学没有手表。星期天休息，只要我留队，班里外出的战友就会借我的手表，以便准确把握归队时间。

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——一天下午体育活动，换好衣服，我把手表扔



在床上就跑出去了，等踢完球回来，发现手表不见了。这可非同小可，班长马上召集战友严肃询问，并让我仔细查找。最终，在被子与床帮的缝隙中找到了，全班人如释重负。此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，怕为此破坏班里的团结。(山东青岛 李仲 61岁)